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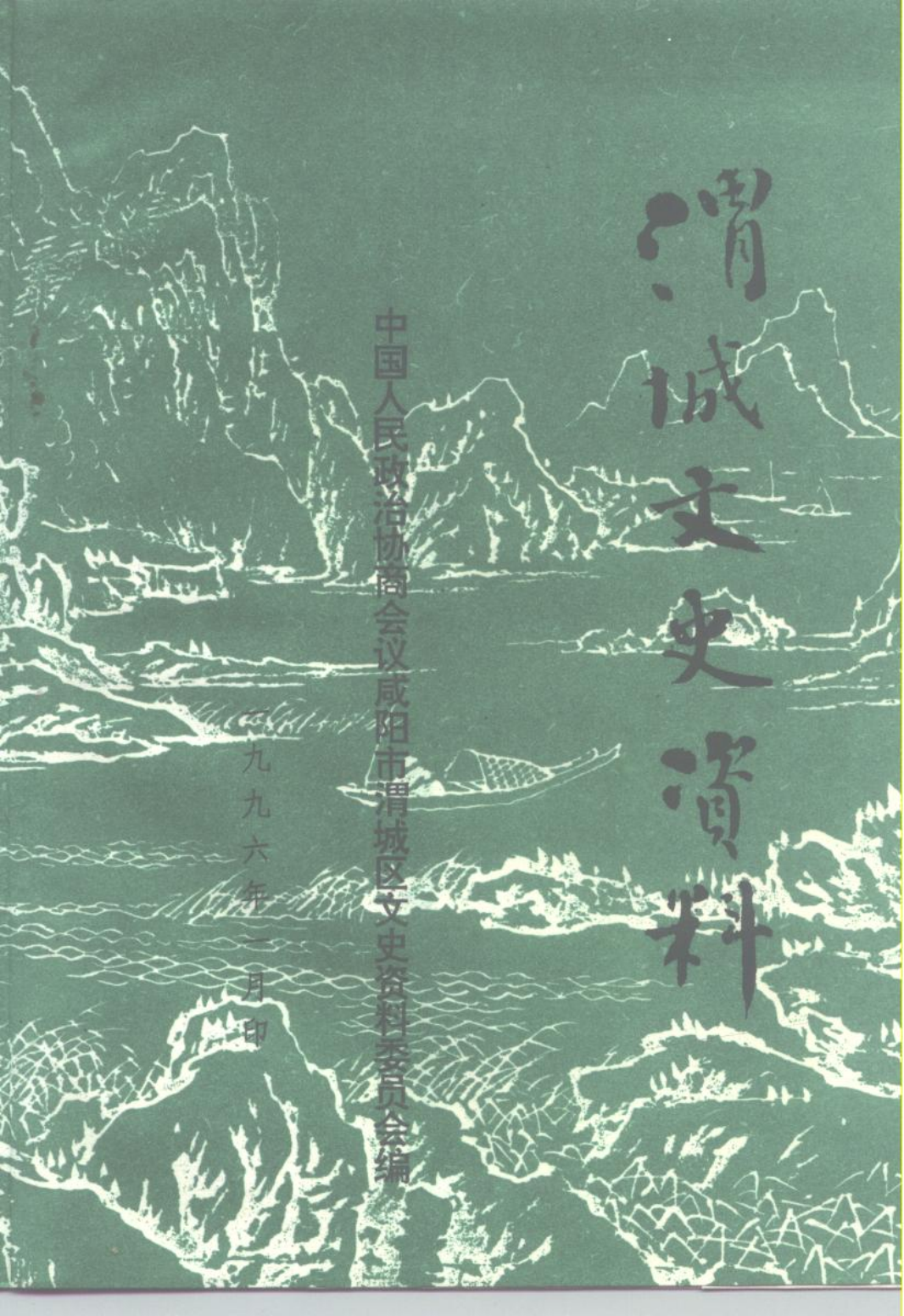
渭城文史資料

第三輯



政协咸阳市渭城区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2504



渭城文史资料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咸阳市渭城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一九九六年一月印

渭城文史资料 (第三辑)

出版单位: 咸阳市渭城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编 辑: 马 忠

承印单位: 西北轻工业学院印刷厂

出版日期: 1996 年 1 月

开本 850×1168mm 32K 100 千字

陕咸新出批字(1995)14 号

存史
資治
教化
團結

存史
資治
教化
團結

目 录

· 经济建设史料 ·

- 咸阳棉业回顾····· 编辑撰稿(1)
- 咸阳民族工业的先驱刘晓岚··· 李宏儒(19)
- 修建渭高抽与宝鸡峡 ······
- 寇凤歧 宁思聪(27)
- 咸阳城区园林绿化记实 ····· 司 岱(35)
- 民国时期咸阳高利贷与信用合作社 ·····
- 解惠英(40)
- 赊 销 ······ 杨振中(44)
- 剃头担子 ······ 窦雄伟(202)

· 抗日战争史料 ·

- 日本飞机轰炸咸阳 ······ 编辑撰稿(47)

· 劳模群星 ·

- 三尺讲台伴余生 田小梅(118)
农业生产的标兵杨玉玲 雷里池(120)
献身农业的杜汉平 田小梅(124)

· 轶事轶闻 ·

- 薛笃弼轶事 刘志海 刘 纯(127)
冤仇相报 赵西文(130)
机场的一次大风灾 曹文君(134)
孝义会 解惠英(136)
顾家沟与古姓 王鹏超(138)
老 院 解惠英(141)
炭 贼 陈 虹(143)

· 宗教与庙会 ·

咸阳佛教寺院

- 安国寺 张德臣(145)
龙华寺 ... 李光文口述 编辑整理(148)

- 浴血奋战 不忘国耻
..... 张正伦口述 编辑整理(50)
看守日军战俘 马忠信(58)

· 咸 阳 人 物 ·

- 赤卫队长张汉俊 赵青文 供稿(61)
教育家副市长程志廉 杜向文(65)
农村文化的一名旗手——赵西文
..... 毛云霄 马 忠(69)
豫剧名花张香芙 毛云霄(81)
姬溥生平事略
... 黄埔同学会渭城联络组供稿(94)

· 文 化 教 育 ·

- 解放初的陕西省文化馆及迁咸前后
..... 李宏涛(101)
东北小学 张德臣(111)
周陵中学门联 编辑撰稿(113)

二月二会 陈 虹(150)

· 海 外 风 情 ·

台岛见闻 黄学广(156)

· 民 间 文 艺 ·

劝善与劝善经 编辑撰稿(172)

咸阳棉业回顾

编辑 撰稿

咸阳位于关中腹地，处交通要冲，有渭水古渡之便，自古商业发达，被称为水旱码头。咸阳的棉花经销业早在清代已很繁荣。泾渭流域盛产棉花，咸阳是棉花的集散地。从事这项商业活动的多是山西人。花商收购棉花，然后又转售到外地。多数被装进船只顺渭水东下。铁路通咸阳后，又兴建了棉花打包厂，半机械化的加工更促进了棉业发展。

附近一些县份棉业也较兴旺，如三原、乾县等，但无地利之便，就其数量与繁荣程度，与咸阳差之甚远。即以乾县为例，乾县为较大县份，民国三十二年（1943）时有棉业五家，咸阳已有二十多家。至1949年时，咸阳棉花业已发展

到 46 家。棉业兴旺发达，促进了市场的繁荣。咸阳的饮食业由 1944 年的 38 家发展到 1950 年的 96 家，即是市场繁荣的象征。数十年间，棉业成为了咸阳百业之首。咸阳的棉业又成了关中棉业之冠。

棉 业 初 兴

在封建社会，商人地位卑下，被人称之为“市井之徒”，或贬称“市井小人”。古俗语中有“舂屠店脚牙，不问便该杀”。棉花行的成员都是店家，也叫牙行或牙家，地位更为低下。清时，开花店先得领牙帖（相当于现今的营业执照），直至民国初年还是如此。当时人们认为“店”字不光采，便尽量避开这个字。如清末时西街有个全魁永花店，招牌上却书为“全魁永号”。当时也有称花店为“花房子”的，也为的避开这“店”字。

花店收购棉花转卖，从中抽头赚利。传统的以农为业的老百姓，均以为当牙家抽头打佣为不光采事。后随社会发展观念才逐渐改变。民国十三年间，山西临晋“永盛政”、潼关“永盛源”和西安“永盛源”，合资在咸阳东街开设了一个“永盛

西花行”，规模较大，资金较为雄厚，时人无敢鄙视。至后来棉业公会建立后，棉花业的社会地位更有提高。

棉花交易

棉花交易有其自己的方式。花行从棉农手中收购棉花，再转手卖给外地客商，从中抽取佣金赚钱。习惯上棉农将皮棉捆成十斤一捆来卖，花店再轧成包成批转发到外地。

棉业经营有几种方式。一种是“收抄庄”，即代客家收购棉花，别堆存储，负责给客人交货，花商从中收取佣金。交货时如有溢余全归客人，短秤则由花行赔偿。这种方式对花行来说不担风险，不受棉价波动之影响。花行对西路小客商多采用这种方式。另一种是“定盘生意”，简称定购。客商按定价付款。定价包括市价加佣金。成交以后，市价涨落，利害均归卖方。花行资本多、存货量大的多是现货交易，可免担风险。东路客商和厂商为了便利，多采用这种交易方式。

花行收花有“九斤十二两”、“秦秤”、“行秤”、“11375、87913”几个称法。

习惯上棉农把棉花捆成十斤一捆担来出售，而花行商人总想压秤，将十斤变为九斤十二两（十六两制）。十六两为一斤，九斤十二两相当于现今的九斤七两半。压秤的作法普遍存在。花商们年终结算后互相询问“去年余了多少号”。余号即是余秤，长了斤两。但实际上余号事不多，余额也不会大。因为棉农卖棉花时用草拧成绳子捆花，称“草腰子”。花行过秤时连草腰子一块过，而向外地采购棉花的客商交货时不能连腰子一块轧包，常常亏秤。尽管是“九斤十二两”，仍包不住份量耗损，于是便钉了一杆“行秤”。

“行秤”是九九秤，即九十九斤顶一百斤，向外地客商发货。实际上是花行亏了外地客人，而不是亏了棉农。虽有“九斤十二两”与“行秤”现象，但一般来说，花行多在棉花价格的涨落方面掌握尺度瞅机会赚钱，在招徕客商上下功夫，扩大营业额，提高周转率，而不愿在收购棉花时和棉农多费唇舌。一些花行每年虽亏秤数千斤，但在经营中获利甚丰。“行秤”在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）前被废除。

在民国十年至二十年间（1921——1931），陇南秦安县的客人成帮来咸阳采购棉

花。秦安客人生活俭朴、布衣粗食，将出门做生意称作“跑光阴”。西街的“日东升”、“忠盛和”、“长信德”，东街的“复兴昶”、“永盛西”、“天德明”等花行先后都住满了秦安客。秦安客买棉花有两个先决条件：一是他们收货要用他们的标准秤——“秦秤”，而不用花行的“行秤”；二是别的客人买花给花行出三分佣钱，他们只出二分。由于这帮客人众多，为增加其营业额以便多中取利，花行一般同意这些条件。即使赔一点秤，而在佣金上也可补出来。

由于花行收花沿用老秤（当时两种秤制，一般老秤比市秤高），客人定买是用市秤计量，所以在交易时就要折算。老秤 100 斤折合市秤 113.75 斤。反之 100 斤市秤折合老秤 87.913 斤。这只是当时的统一算法，实际上这种算法并不标准。标准的算法是老秤 1 斤折合市秤 1.1763 斤，市秤 1 斤折合老秤 0.85 斤。这种计算方法一直沿用至解放。建国后才划一了秤制，取消了老秤，统一了市秤，后又改每斤十六两为每斤十两，至今称“十两秤”。

棉 业 组 织

棉花业最早的组织叫“棉花行”。成立于清末，属于商务会。棉花行有一个行头，负责办理事务。行头由会员轮流担任。花行至民国二十七年（1938）改为咸阳县棉花同业公会，直至1951年底。

同业公会有主席（以后称理事长）、副主席（以后称常务理事）和执监委员（以后称理、监事）。发展至1950年，成为咸阳私营工商业中最大的一个行业，有会员75家，其税费负担占咸阳全县工商业者总负担的21%。咸阳的花行有个规矩：要加入花行同业公会，除公会转商会再呈政府批准外，还得向公会缴纳入行会50斤棉花，别业则无。

民国二十三年（1934），“陕西省棉产改进所”成立，后又改名为“陕西省农业改进所”，对陕西棉花生产之推广与改良起了一定的作用。后来，又给产棉区各县设立了“取缔棉花掺水、掺杂检验所”，属省农业改进所领导。咸阳棉检所首任主任王北屏，三原县人。他办事认真，铁面无私。花行商人怯惧他。因为一旦质量不合格，

他严予要求，必须另抖杂质，另行轧包，花商遭受损失。这对于提高咸阳棉花的质量信誉起到好的作用。

棉 业 进 程

作为经济作物的棉花，是陕人主要经营的农作物之一。清时棉花的品种叫“茧花”，辛亥革命前种“小洋花”。民国二十年（1931）以后改种“德字棉”，纤维长、获利高。直到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）又改种“斯字棉”。解放前数年的棉种叫“美种棉”。自民国十八年（1929）关中大旱灾后，杨虎城将军主陕工作，委水利专家李仪祉为建设厅长。李在陕兴修水利卓有成效。关中修成八惠渠——渭惠、泾惠、梅惠、黑惠、洛惠、沔惠、千惠、涝惠。陕西农业渐渐走向科学化。棉田面积大增、产量剧增。据旧时华商纱厂联合调查，民国九年（1920）陕西棉田面积为1183012亩，至二十七年（1938）已增至3829892亩。同期内产量由350997担增至1070290担（每担100市斤）。杨虎城将军在咸阳兴办尧山油厂，后改名裕农油厂，就地收购

棉籽榨油，更有利于促进关中棉业发展。

棉花种植业的发展，直接促使了棉花商业的繁荣发达。

早先，咸阳经营长久的有一个“积厚德”花行。业主在清代就经营棉业，至杨静安承祖业。“积厚德”本来门面窄小，资金不多，可杨氏善于经营，生财有道。他挂出招牌“代客买卖生熟棉花”。花行有几台轧花车子，可代棉农将籽棉轧成皮棉，可收皮棉，可收购棉籽，可换油。兢兢业业，小买小卖，从不冒险，生意长久。使“积厚德”从一个小店发展到有街房三院、住宅三院、水旱地一百多亩的资金雄厚的大商号，从清代始，跨越了一个民国，直到解放后的1951年底。

民国十五年（1926）镇嵩军围咸阳城，棉花业停顿。解围后复业者仅十余家，但西路小额采购者来咸接踵而至。西路棉价高于咸阳。如1943年咸阳的好花每市担5670元，而本地无人要的霜花和平凉可卖6825元，兰州价更高，所以兵劫后棉业复苏仍较繁荣。直至民国十八年关中大旱大寒，陕棉为24年中最低产量，市场棉花短缺，花行仍派人在冰天雪地里下乡寻购。

约在民国十九年（1930），泾阳商人买了一台“三洋牌”铁轧子，在咸阳东街开设了一个“公信班”（音“深”）花行兼轧花厂。由于厂方讲求信誉，不轧坏花，因而创出了牌子，生意兴隆。在郑州的棉花市场上，咸阳“三洋牌”棉花卖得快，售价高。“公信班”生意赚了钱，便在北平街买了一院房，由东街迁入新址营业。与此同时，本地方的“万源福”开设了一个“同兴福花行”兼轧花厂，称作“三星牌”。“敬新福”开设了一个“敬新花栈”兼轧花厂，称作“双龙牌”。其规格和产品信誉均不能与“三洋牌”相比。

至民国二十年后，咸阳棉花多向东运销。西安的“同心成花行”由咸阳采购棉花向郑州贩运，并在咸开设了一个“德纪花行”，专事棉花收购。咸阳本地的“义胜德油店”也开设了一个“义胜花行”，向郑州自运自销，兼代客商买卖。

约在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）棉价惨跌。每百斤棉价在郑州由五十几元跌至三十几元，咸阳由四十几元跌至二十几元。凡贩运的客商都遭惨重损失，是数十年中棉花贩卖业的一次大灾难。

1936年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。至1937年“七·七事变”之间的半年多，物价稳